

鲁迅文化基金会 丛书
LUXUN CULTURE FOUNDATION

渐远 渐近

鲁迅“立人”思想
启示录

刘国胜◎著

鲁迅离我们渐远，然而他的“立人”思想却离我们渐近。
这是深知鲁迅思想精髓及其价值之言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鲁迅文化基金会 丛书
LUXUN CULTURE FOUNDATION

014002019

I210.96
34



渐远 渐近

鲁迅“立人”思想
启示录 刘国胜◎著



北航

C1690020

I210.96
3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渐远渐近: 鲁迅“立人”思想启示录 / 刘国胜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086-4024-2

I. ①渐… II. ①刘… III. ①鲁迅 (1881~1936) — 思想评论 IV. ①I21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101612 号

渐远渐近: 鲁迅“立人”思想启示录

著 者: 刘国胜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9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024-2 / I · 382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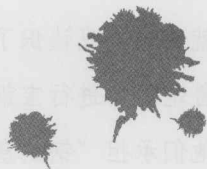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北航

C1690020



周令飞序

“鲁迅文化基金会丛书”是由鲁迅文化基金会与出版社合作，以鼓励、支持与鲁迅及当前文化建设有关的大众读物持续性出版的丛书。本着“弘扬鲁迅精神，推动中国现代文化创新发展”的宗旨，要让更多的人通过走进鲁迅世界，关心现代中国文化，共同开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新天地。

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历程。鲁迅以其文学和思想成就，已构成一座屹立东方、映照世界的文化历史坐标，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国民走向爱国、奉献、创新之路，也架起世界了解中国、认同中国的文化桥梁；同时，鲁迅自身已经形成并由此开创的精神价值，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具有强大的思想力和生命力，时时为中国提供强劲的动力，是流淌不止的现代中国文化源泉。

围绕着鲁迅及其拓展的现代文化方向，我们有许多整理工作、总结研究和运用实践的事情要做，尤其是应用与实践。因此，一接触到刘国胜先生在企业研究和传播鲁迅“立人”思想时，我便震惊了，并且决定将其纳入“鲁迅文化基金会丛书”予以出版。

“国家发展，关键在于‘立人’，在于人的发展。企业发展同样如此，宝钢二次创业的目标能否实现，能否基业长青，关键在于宝钢人的发展。”（刘国胜语）鲁迅竟然可以这样走进社会、走进企业、走进人心。随即，我看到刘先生拜访著名鲁迅研究学者钱理群先生、和他谈鲁迅思想的理解和应用，他还邀请钱先生赴宝钢讲鲁

迅，为了深入理解鲁迅思想，他长期潜心钻研鲁迅著作，让我深深感到他对鲁迅的深情和投入。

就这样，我认识了刘国胜先生。在和他面对面的交谈里，我进一步了解到，他选择鲁迅思想进行宝钢集团人员培训的缘由。他说，作为中国最好的钢铁企业，尤其是他们承担“钢铁皇冠上的明珠”的取向硅钢任务的硅钢部，和制造高等级汽车钢板的宝日汽车板公司，是与世界领先水平最接近的两个单位。在调查研究中，这两个单位的管理者、技术专家和操作工人说，他们正在赶超国际同行的“排头兵”企业，虽然开始阶段困难重重，但是通过努力，上最好的设备，上最高的技术，上最好的管理制度。这些硬件设施，很快就可以和德国、日本同类企业并驾齐驱。但生产的产品始终达不到人家同样的品质，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出现使出浑身解数仍然徘徊不前的状况。分析个中原因，他们发现，在执行制度和技术规范方面找不出什么问题，根源在人的职业态度和专业技能——也就是人的素质造成的。

他说，硅钢部和宝日汽车板公司的管理实践表明，当企业发展到比较高水平时，再要进步，就制度谈制度，或者就技术谈技术，已经不解决问题了。制度和技术是极其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质。不同素质的人，执行同样的制度、运用同样的技术，效果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人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中国企业与世界同行领先企业的差距，根本上是人的素质的差距。他因此把吴敬琏先生的一个著名观点“制度重于技术”补充为“人的素质重于制度和技术”。

为此，刘国胜先生深入钻研鲁迅著作，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了鲁迅的“立人”思想，他将鲁迅的“立人”思想分为五个方面：“立人”的重要性；“立人”的目标；“立人”的途径和方法；“立人”的基本要求；“立人”的切入点和根本点。并精心设计出一幅“鲁迅‘立人’思想结构图示”。他在宝钢集团内部作“鲁迅精神对宝钢人发展的启示”专题讲座，还在上海《支部生活》杂志发表了每期3000字左右的系列文章：“鲁迅‘立人’思想启示录”。直到今天，刘先生将这些年来的思考凝结成为文字集结成书，将其贡献给全社会。

刘国胜先生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发掘和应用，让我不禁想起钱理群先生这些

年来不断在各种场合为中学生讲鲁迅这件事情。钱先生退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他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讲鲁迅，随后又到北京大学附中、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去给中学生讲鲁迅，其实不是作演讲，是开一门课，后来，他还到台湾“清华大学”给台湾的本科生开课讲鲁迅。钱先生向青少年朋友讲鲁迅作品选读，引导中学生从感受鲁迅到阅读鲁迅、研究鲁迅，并最终“言说鲁迅”，达到理解鲁迅，进而理解中国、认识自我。因为多种原因，他的专题课程并未能继续下去，但希望把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把现代中国最好、最优秀的文化价值向大众传播，为历史负责地传承下去，这份心愿、这份努力在深深地感动我，激励我们。

刘国胜先生“活学活用”鲁迅的作品，把鲁迅精神和思想应用到企业思想教育和素质培训里，和钱理群先生向中学生讲鲁迅一样，努力将最优秀的文化价值向企业、向职场传播。大可期许，钱先生和刘先生的这份努力一定会产生丰硕的成果。作为鲁迅的后人，我愿意郑重地向读者推荐他的这本书，为弘扬鲁迅精神、推进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添一块砖、加一片瓦。

周令飞

(鲁迅文化基金会秘书长)

2013年元月



钱理群序 “我们现在需要鲁迅”

“当今中国是否需要鲁迅”一直是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一些人看来，鲁迅所代表的，是一个错误的传统，在今天是有害的，应该坚决抛弃。持这样的“全盘否定论”的，并不多，但其影响却不可忽视。另一些人则并不否认鲁迅的价值，却认为他在今天已经过时或不合时宜，应该进入博物馆，成为可尊敬，但与现实无关的历史人物。更多的人，对鲁迅知之不多，更无兴趣，自然认为鲁迅与己无关，不过是一些文人、学者的研究对象罢了。当然，也还有人觉得鲁迅的思想存在会有碍于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希望逐渐淡化，以至消解鲁迅的影响。

我曾用“有人欢喜，有人骂，有人怕”，来概括鲁迅在当下中国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应有的命运。其实鲁迅出现在中国文坛以后，一直是“有人欢喜，有人骂，有人怕”的，如果没有人骂和怕，恐怕就不是鲁迅了。因此，在如何评价鲁迅的问题上，存在争议，也是正常的。但从另一方面看，这样的争议，关系着对鲁迅所创造、积淀、代表的思想资源、精神传统，及其现实意义、价值的认识，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现实政治、思想、文化、教育问题，必须据理力争，认真对待，不可掉以轻心。

我自己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多年来，一直坚持“我们现在需要鲁迅”的观点，写了大量的文章，作了无数演讲，可以说是倾注了几乎是全部的心血。这不仅出于我的信念，自我生命的需要，也是当作当代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建设的一件



大事来做的。在这一过程中，有人不理解以至误解，是预料中的，而始终得到朋友们的理解和支持，既是期待之中，又常常出乎意料，让我感动不已。

我和刘国胜先生的相遇与合作，是近年来最让我惊喜的。关于我们之间的交往，刘先生在其“引言”里已有说明，不再赘述。我要说的是，我和刘国胜先生之间，无论是各自的工作、领域，还是彼此的经历、身份、地位，都存在巨大的差异，用上海话来说，是“勿搭界”的；但现在却因为鲁迅发生了关系。一个“实际工作者”（刘先生语）和“研究者”在对鲁迅认识上达到一种共识，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在我看来，这是预示着在当代中国，鲁迅走出了书斋，学院，而真实地走进了现实生活，这样一个“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的前景，是能够给人以“微茫的希望”的。——当然，这里说的“预示”是可以质疑的；但至少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期待，或者说有了一种可能性，由可能变成现实，自然还要经过努力并不免要走曲折的路。

读刘先生的大作，我最大的感触是，一个真实地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敢于正视现实中国的问题，对中国的改革富有历史责任感，而且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的人，他是迟早要和鲁迅相遇的，他对鲁迅的体认，是那些把鲁迅当作老古董、敲门砖的所谓研究者所难以企及的。因此，刘国胜先生提出“中国现在需要鲁迅”的命题，完全是自己的独立见解，有自己的独立发现，并且有自己的三大理由。

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句话：鲁迅的“立人”思想是“现代中国人的发展之道”；“人的发展问题，当代中国人的发展问题——这是当代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这里无论是对鲁迅思想内涵与价值的体认，还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与把握，都点到了要害，十分精辟。

刘国胜先生以“鲁迅‘立人’思想启示录”作为本书的副题，表明他对鲁迅的理解与论述，是以鲁迅的“立人”思想为中心的；而他对“立人”思想的理解却相当独到：鲁迅关注的始终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发展”的问题，“现代中国人的人生之路怎么走”的问题。这样把“人的发展”和“现代化道路”的问题联系起来的理解，是符合鲁迅的思想实际的。

鲁迅的“立人”思想从一开始就是和“立国”即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连结在一起的。在鲁迅这里，“人的发展”是“立国”的前提与基础，又是现代化的目标。这是鲁迅对中外历史经验的总结。他在《文化偏至论》里，明确指出，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固然是对人的权利与尊严的剥夺，西方工业文明发展到极端，也会形成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压抑。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当然需要物质生活的富裕，科学技术的发达和民主的发展；但如果简单地“以富有为文明”，“以路矿为文明”，“以众治为文明”，“惟物质为文化之基”，而忽视“尊个性而张精神”，那就必然导致“本体自发之偏枯”（东方专制主义）与“交通传来之新役”（西方文明病）“二患交伐”的“沉沦”。以后，鲁迅又将他的“立人”思想概括为一句话：“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忽然想到（六）》），并且有这样的说明：“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北京通信》）。如刘国胜先生所说，鲁迅这一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思想，是应该照亮整个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而且鲁迅关于人的发展还有超越性的思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鲁迅关于‘立人’的大部分论述，是关于人的发展的一般性论述，具有超越时空的经典性，不仅至今没有过时，没有陈旧，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愈发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作为一位已逝的历史人物，鲁迅离我们渐远，然而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先生的‘立人’思想却离我们渐近”。——这是深知鲁迅及其价值之言。

这里还包含着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认识与判断。在刘国胜先生看来，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是一个“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也即基本解决了鲁迅所说的“生存，温饱”问题以后的问题；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归结到一点，是人的问题，人的发展问题”。——这也说到了点子上。毫无疑问，中国今后的发展，仍然要注意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这不仅是因为还有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的生存、温饱问题并没有解决，更因为从“国富”到“民富”，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达到共同富裕，还有许多的事要做，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如果以为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将陷入“经济决定

论，唯一论”，就会重踏鲁迅当年所警告过的“以富裕为文明，以路矿为文明”的覆辙。刘国胜先生说得很好：是否重视“当代中国人的发展”，将其置于核心位置，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一个关系到发展方向的问题”。而所谓“当代中国人的发展”问题，是包含了多层次、多方面的：人的生存环境（政治、社会、生态环境），人的权利和平等，人的精神自由，人的尊严，人的道德水准，人的全面发展，国民素质……等等，这些方面构成了鲁迅“人的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刘国胜先生书中都有或详或略的论述。这些问题恰恰是当今中国所没有解决，或急待解决的，任何有意无意地遮蔽，都会影响发展的方向。

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是面临一个全面改革、全面发展的问題，而这些改革又是相互依存，相互纠缠与影响的。如刘国胜先生所说，“人的发展，不仅有赖于经济的发展，而且有赖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发展。反之，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发展，又有赖于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科学发展’是实现不了的”。——这都可以视为“警世之言”。刘国胜先生作为一个企业人，本是极容易落入将经济发展绝对化的陷阱的，他能够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不能不令人感佩不已。

这其实是显示了刘国胜先生的企业观与经济发展观的。他在本书里，一再强调：“企业文化是企业之魂”，“企业管理的最高水平是文化管理”；在他看来，企业的发展不仅是经济、科学技术的问题，同时是一个文化问题，同样需要有“文化的自觉”。而刘国胜先生的独到之处与贡献又在于，他将企业文化的核心，定位为“人的发展”。这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企业的发展“无疑是为了人的发展——为了所有人的发展”，也即企业全体员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与工人）的健全发展，这是企业发展的目标与方向；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又仰赖于人（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与素质的提高。作为企业的领导人，刘国胜先生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他如此提出问题：“为什么中国企业与世界同行的领先企业相比，普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明显差距，为什么中国的绝大部分企业生产不了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高端产品？”回答是：“这主要不是技术和管理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素质问题”。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突破人的素质瓶颈，过好人的发展这一关”。应该说，

这是抓住了企业发展的“牛鼻子”的。由此刘国胜先生也发现了：“鲁迅的作品，与企业员工的心是相通的，鲁迅的‘立人’思想，与企业员工发展和企业发展的关系密切”。他一再申说：“‘立人’是所有工作中，最重要、紧迫的工作”，“‘立人’成功，企业才能做强做优”：这构成了刘国胜先生提出“我们需要鲁迅”这一命题的第二个强有力的理由。

这是一个非常独到的理由，可以说是刘国胜先生的独立发现与独特的贡献。这又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刘国胜先生告诉我，他们在创建宝钢企业文化时，遇到了“从哪里去寻找”文化资源的问题。最初的思路是学习国外企业文化经验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也确实有收获，今后也还要继续这么做；但总觉得有些“隔”。经过一段摸索，发现了鲁迅的“立人”思想，才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完全理解刘国胜先生和他的同事的这种惊喜感：在我的理解里，鲁迅的思想里是积淀了“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它对于当下的中国确实是更为切近的，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从现代中国延续下来的，鲁迅他们当年的思考，就具有了直接的启示意义。刘国胜先生在文章里，谈到前述企业文化建设中所遇到的文化资源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对中国古典人文精华进行‘现代化’改造，和对外国人文精华进行‘中国化’改造的有机统一”的问题，而鲁迅的“立人”思想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成熟的经验。因此，刘国胜先生对鲁迅“立人”思想的自觉引入，无疑是对企业文化建设开拓了一个全新的，也是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即“二十世纪中国经验”，其意义与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把鲁迅思想作为“20世纪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这也是对鲁迅思想及其价值的认识的一个深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深我们对鲁迅思想的实践性的认识。鲁迅早年就竭力推崇“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就是鲁迅的自我定位。鲁迅绝不是在书斋里空谈的文人、学者，他的思想既是对政治、思想、文化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升，同时也是对实际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直接参与。刘国胜先生说得好：“鲁迅的‘立人’思想是直面现实的——它固然有形而上的品格，有思想的高度，但它不是远离现实的，供人欣赏和



玩味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鲁迅的思想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实践，例如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企业文化资源？正是在这一点上，刘国胜先生这样的实际工作者，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读本书，对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刘国胜先生依托宝钢企业文化建设的经验，对鲁迅“立人”思想所做的创造性的发掘、解读、发挥与运用，从中提出了许多极具启发性，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思想与行动原则，诸如首在“立人”的企业发展目标；“人非信无以立”、树立企业人的理想与信仰；“改革国民性是根本”、员工行为习惯的养成；实行“拿来主义”，企业的开放和创新；以诚为本的企业道德；以“爱”为纲，互助相师的人际关系建立；韧性精神、实做苦干、泥土精神和认真精神的培育；倡导“深沉的勇气和明白的理性”等等，最后归结为“让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尽管这些讨论未必完全精当，但将鲁迅的思想命题与企业文化发展实际结合的尝试，却显然具有开创性与启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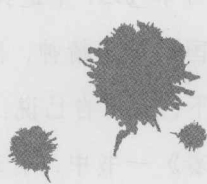
刘国胜先生所提出的第三条理由是：“这是我自身的内在需要”。他在书中深情地写道：“我热爱鲁迅，需要从鲁迅作品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事实上，在读鲁迅、讲鲁迅的过程中，鲁迅的‘立人’思想，使我的灵魂得到安抚、净化、升华，增添我直面复杂问题的勇气。”在谈到这本书的写作时，也谈到“在我难以支撑的时候，总是有鲁迅在《过客》中描写的那种感觉：‘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这些讲述虽然简单，却很感人，也具有启发性：阅读与学习鲁迅，是必须把自己的心放进去的，这是心灵的对话，生命个体之间的交流，没有这样的对话与交流，是永远读不懂鲁迅的。

我还发现刘国胜先生对鲁迅“人要有余裕心”的思想，独有会心。这样的会心又是建立在现实生活中刻骨铭心的生命感受和体验基础上的：“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如此强大的物欲和难以消化的资讯所笼罩。在物质生活大大改善和精神生活的表层‘丰富’中，留给人的主动活动、高尚精神活动的余地越来越小。带来的后果是，人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被严重挤压，特别是独立思考的时间减少，精神空间压缩”，“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乃至人的‘活气’‘要灭尽的”。

如果这样，‘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这样的从自我生命体验中去接近鲁迅，就把握住了鲁迅的真正价值：这是人的精神家园，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精神的元气，获得生命的独立，丰富，崇高和大气。这是精神越来越荒漠化、低俗化的当今中国，所需要的。

钱理群

2012年12月9日—10日



引言 鲁迅的中国价值

我想先谈谈我是怎么会写作此书的，从我读《鲁迅全集》谈起。

一、我读《鲁迅全集》

我敬仰鲁迅先生。我生于1951年，少年时代的最后两年，加上青年时代最重要的一段，15至25岁时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当时所能读到的书极少，所幸的是还能读到一些鲁迅作品单行本。至今我还珍藏着1974年阅读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呐喊》等著作。那时，虽然读不太懂，但是先生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就此长留我心间。1992年，我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四卷本的《鲁迅选集》，认真地读了一遍，还做了摘录，写下了读书心得。1996年和1999年，我先后在上海《支部生活》、《组织人事报》和《党政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员要学习鲁迅，继续解放思想”和“读不尽的鲁迅”等文章。2003年2月，我到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长、党委书记后，不时重温鲁迅作品和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却始终没有读过《鲁迅全集》。

近几年来，我心中的鲁迅情结，加上以下几个因素，促使我去读《鲁迅全集》。



其一，我在作家、诗人郁达夫著《回忆鲁迅》中，看到他在鲁迅逝世后的1936年和1937年这样写道：“鲁迅虽死，精神当与我中华民族永在。”“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①上述文字对我触动了一下，我对自己说：那该读啊。我又看到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著《痛并快乐着》一书中，有这样的话：“鲁迅当年入木三分的民族性分析至今仍未过时，还时有警世恒言的作用。”“可惜的是，生在中国，自称知识分子却一直没有通读过鲁迅，这让我长久不安。”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性问题：“走进孤岛，我会带上哪一本书？”（假设上岛时间为两个月，只许带一本书）他的回答是：带本厚厚的《鲁迅全集》。^②我想，我比白岩松大好多岁，他可以作如此假设，我的假设余地却比他小多了，要读就赶快读吧。

其二，近几年来，我经常思考着理想信念教育问题。我的实践告诉我，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然而，就我已经做的这方面的工作而言，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我在讲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时，没有联系理想赖以产生的思想资源，即古今中外的人文精华来讲。我意识到，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本是集大成的思想，只有联系“被集成”的文化底蕴来讲，才有厚度和深度，才可能产生打动人心的效果。但是，我的知识积累太单薄，需要补课。我在书房里一排排扫描我的藏书，当看到整整齐齐列在醒目位置的鲁迅作品，心中一亮，何不下决心去读《鲁迅全集》呢！

其三，2008年，我在读了人文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的几本著作后，慕名前去拜访他。在介绍了我的工作单位宝钢的概况，特别是我们联系实际具体地践行“以人为本”思想的一些思考和做法后，邀请他到宝钢作关于鲁迅的讲座。钱教授有点诧异（按照他后来的说法是：“我的很多朋友听说我要到宝钢讲鲁迅，他们都吓了一大跳”，“最初，刘国胜书记到我家请我讲鲁迅我也吓了一

① 郁达夫《回忆鲁迅》，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03、111页。

② 白岩松《痛并快乐着》，北京：华艺出版社2006年5月第2版，第300—302页。

跳”)^①，他问了我两个问题：“鲁迅和现代企业有什么关系？鲁迅的哪些作品适宜于企业人阅读？”当时，我无法回答好这两个问题，就说：“待我做了‘功课’后再答复您。”

于是，我就取出10多年前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16卷本的《鲁迅全集》，开始通读。

二、我对钱理群教授两个问题的答复

读《鲁迅全集》第一卷的《文化偏至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②的论断，引起我的强烈关注和共鸣。我是在不断思考着“立人”的命题时，把《鲁迅全集》一卷接一卷读完的。通读后，我先按照全集的顺序做了摘录，在此基础上，列出“立人”的一个个小专题，并按专题做了摘录。我的工作相当繁忙，经常需要加班和出差，即使节假日，可用于读书的时间也不多。好在长期来我有意识地减少“在位的热闹”，且养成了利用片刻时间读书的习惯。特别是鲁迅思想和文字的巨大魅力，给我增添了读先生作品的强大动力。2009年，我通读了《鲁迅全集》，并且大致完成了由14个小专题组成的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初步梳理。我清楚，读先生作品需要静心。自己这种忙里偷闲、非沉静状态下的阅读，对鲁迅“立人”思想的领会是粗浅的。即使如此，我依然获益匪浅。我深深地被鲁迅“立人”思想的深刻性、完整性和超前性所折服。先生“立人”思想对我的启示，有许多是我读其他书籍时所未曾有过的。

我把对鲁迅“立人”思想的梳理稿送给钱理群教授，同时准备了一份针对企业人的鲁迅作品选读目录。钱教授在百忙中给予我热心指导，我重新整理出一份《鲁迅论中国人和社会的改造与发展》，由“目标篇（上、下）”、“道路篇（改革之路、开放之道）”和“精神篇（硬骨头精神、韧性精神、泥土精神）”三大部分组成。同

① 钱理群《梦话录》，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第1页。

② 《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58页。



时，他对我准备的企业人鲁迅作品选读目录作了调整。之后，钱教授应我邀请，于2010年3月27日，来宝钢作了关于鲁迅的专题讲演（讲演稿已收入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钱理群著《梦话录》，此书被《中华读书报》编辑部评选为2012年度10佳图书之一）。

钱教授的指点，对我而言是弥足珍贵的，使我深受启迪，并促使我对包括宝钢在内的现代企业的发展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我觉得，钱教授所传播的鲁迅的思想以及他本人联系宝钢、企业和当代中国实际的思考，将长久地留在许多宝钢人的心中，在宝钢员工与企业的共同发展中起作用。

有了以上的过程，我开始尝试着回答钱理群教授提出的两个问题如下。

1. 关于“鲁迅和现代企业有什么关系？”

钱教授说的企业，当然是指中国企业。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所思考的问题。在我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工作，经历了中国企业从相当封闭走向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发展很快，变化很大。当上一代企业人回到今天的企业看看，已经极少有当年的面貌了。但是，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不够强大，即使像宝钢这样的行业领军企业，仍然不够强大。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做着产业链的中低端产品。尽管进入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行榜的中国企业已经有好几十家，但是众所周知，那是按照营业收入的排名，所谓500强，其实只是500大，其中既有一大批真正强的企业，也有不少只大不强的企业。

中国企业要做强，最大的问题是人的素质的问题，包括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在内的全体员工的素质的问题。既有技术、技能、业务素质问题，更有比这些素质更重要的人文素质问题。什么样的人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提高人的素质问题，这正是鲁迅在一个世纪前就提出的“立人”问题。2012年10月，我参加鲁迅文化基金会成立会议暨2012鲁迅论坛，提交了题为《鲁迅的“立人”思想和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论文，专门谈了鲁迅的